



杨炼在2012年意大利诺尼诺文学奖颁奖典礼上

## 提问者、诗人和思想家的姿态

获得2012年意大利诺尼诺文学奖，是中国游吟诗人杨炼在“无根”的土壤之上，以自己漂泊与写作的理解，栽出的一朵超越“孤独”的花。同时，他对诗人与流亡、文化与良心、作家与深度、写作与困境等现实问题，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 采访：特约撰稿 夏楠 图片提供 杨炼

2012年1月，杨炼从英国奔赴意大利，参加2012年度诺尼诺国际文学奖颁奖典礼。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担任主席的评委会向世人肯定了杨炼：杨炼的诗歌是中国当代思想的制高点之一。奠基于他的千古文化之根，他重新阐释它，向当代张力再次发明和敞开它。他的诗句触及了关于我们存在的所有最重要提问，并提醒我们“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他在一种并非仅仅疏离于自己土地的漂泊中，把生存和写作的景观推到极致。一个有着深刻距离感的诗人，远远超越出我们的时空。

### “诗人必定是流亡者”

1992年初，杨炼抵达纽约。这是他自1988年8月8日离开中国后到达的第三座城市。此前他先后旅居在悉尼和伦敦。偌大的纽约，他认识的朋友寥寥无几。一个人住在窗口开向哈德逊河的房间，他感到自己正在沉下去。在收录了他1982年至1993年全部诗作的诗集《大海停止之处》中，杨炼写下的诗句“四月/以河流为幻影/河流那忘却的顾

色/以我们为幻影”，让人深深感受到他在那个时刻的心情——那两年，被杨炼称为漂流途中“最黑暗”的时期。

“生存的压力且不去说，用什么填满‘为什么写’和更严酷的‘怎么写’那个黑洞？领域就是在这个黑洞中消失的。他的悲剧，集历史的遭遇和写作的困惑于一身。他写于同一时期的作品《鬼进城》与其说是新的美学探索，不如说是现实连贯性的崩溃。”杨炼在接受访问时这样说道。

抵御着现实性的崩溃，杨炼经历了很多艰困时刻，正是这些时刻成就了他的诗歌之路：“诗人得找到一种能够归纳现实的形式，以使自己的语言——和自己——活下去。作为当代的中国诗人，在远离故土的外国，‘无根’的痛苦是经常性的体验，‘无家可归’的悲哀甚至是一种必需。在每个早晨醒来，陌生的房间都在提示我一个梦中的房间。”

在他的中国梦中，有一幅永久的画面：北京西郊，圆明园废墟附近，一间由教室改造而成的名为“鬼府”的小屋，半块玻璃黑板做成的书桌记录了杨炼作为青年诗人的全部

幸福，属于能突破生命限定的人，或者说，有能力成为自己鬼魂的人。他的专业，是在自己身上考古，且一次次亲历发现的震撼。

——杨炼的诺尼诺受奖词

经历。在他的书柜里，珍藏着两只骨灰盒，一只母亲的，另一只是老保姆的。她们在那儿，让他总是感受到两束呵护的目光。

“无根”的体验与温暖相伴的梦的冲击，独特的个人内心体验支持着他的诗歌创作：“一个人能在任何地方生存写作，因而不必抱怨命运把你抛到了哪里。真正的问题，不是‘我离开中国多远了’，应该是‘我在自己内心和语言里挖掘多深了’。”

作为诗人，杨炼对自身的文化命运有着更为透彻的意识。在他看来，“诗人必定是流亡者”。但他的“流亡”一词被赋予了主动、积极的含义，那是创造性的自我本来的精神定义。也因此，“孤独”成了“独立”的同义词。“距离”提供了反思自己母语和文化的意义——“它绝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每个诗人最后安身立命之所，更是我们古老文化的鲜活能源。归结到底，人性之美蕴含了诗歌之美。这美丽不依赖外在时间。诗歌本身就是时间，它终将安顿我们，尽管历经劫难。”

### “所有的文化都建立在良心之上”

回顾过去30年，思想和文化交流是杨炼漂流生活中最温暖的部分，同时也为他提供了精神资源。对于他来说，很多非常优秀的朋友，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尔·科特、索因卡和逝去的布罗茨基、苏珊·桑塔格等的友谊都令人感动。他们一起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朗诵诗歌，一起聚会聊天。还有当代最好的视觉艺术家、思想家，以及各种艺术节、美展上遇到的同行们，都为他的创作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氛围：“从精神交流的丰富方面讲，我是满足的，这也是对那种艰苦孤寂的一种补偿。”

苏珊·桑塔格生前，杨炼每次去美国都会打电话给她，也多次去过她在纽约的俯瞰哈德逊河的美丽寓所。直到现在，每当杨炼回忆起这位近代西方最引人注目，最有争议性的女作家、评论家时仍感慨万千：“她的头脑整个就像一部思想机器，不停地高速运转。我不得不承认，那实在不像一个女人的思维状态。话说回来，她家里的布置，正处处体现出男人的粗犷加女性的温柔：谁见过把一辆帅气的摩托车——她儿子的礼物——停在客厅里的？但她招呼起客人来，又活脱一个家庭主妇。苏珊当过妻子、当过母亲，晚年又和一位女士同居，在性别上，也是一派特立独行。”事实上，无论她在性别批判上的争议如何，杨炼始终对她深怀敬重：“所有的文化都建立在良心之上”——这不仅是杨炼对苏珊·桑塔格的评价，也是杨炼对以苏珊·桑塔格为代表的欧美知识分子的评价——“实际上一个文化，或者一个社会需要一种来自内部的但是又保持距离的清醒的观察和批判，或者批判性的思考。”

在漂泊的日子里，杨炼还与阿拉伯著名诗人阿多尼斯做过《诗歌将拯救我们》的对话，这段对话，也被视为他的思想表达：“实际上，诗人是在不停地把自己创造成新人，我们在每一行诗里寻找一个自我，同时在写完这行诗后我们又又在抛弃这个自我，而文化的活力就来自于个人的不停的创造性。”

### Q：《周末画报》 A：杨炼

#### Q：此次获奖的感受如何？

A：我当然很高兴了，但不仅因为获得了这个奖，而是因为评委们敢把这样严肃的奖评给“我这样的”中文诗人。这里包含多少挑战性极强的层次：对中文古典诗歌和文化的占有；当代对传统的再阐释和再理解；中文当代诗在观念 and 形式实验上的极端创造；我30年写作中每一部作品的区别和它们构成的漫长旅程；还有重要的——原作对翻译提出的高要求（这严厉的的挑战构成了我一直追求的中外深度交流的基础）。其实用高兴来表达我的感受太肤浅了，真正值得探索的是这个奖肯定了思想和诗歌的真正价值。

#### Q：诺尼诺国际文学奖为何会青睐于你？

A：我不认为他们在乎谁是那个“你”，是作品的品质获得了“青睐”。具体说是：对传统的自觉；对自我的追问；对诗歌观念和形式的创造。而它们都集中在一个焦点：深度。

#### Q：长久游走于世界，你是如何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中写作的？

A：每个人都是一个文化碰撞、杂交的案例，问题在于你如何应对这处境。我的原则很清楚：作一个主动的他者——独立思考为体，古今中外为用。我在世界各地，但我更始终在中文之内。只要对自我、对中文提问的能量在，诗歌写作的血脉就始终通畅丰沛。面对全球化塞给我们的“大现实”，诗人思想家应该还给它一个诗意创造的“大传统”。

#### Q：二十多年的漂流状态给你的身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它们对你的写作是成就吗？

A：我认为流亡或者说漂流的状态，其实古往今来莫不如此。杜甫漂流到四川和我漂流到伦敦其实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当然以今天我们这个语境而言，如果概括为一个方程式的话，那应该说是距离产生自觉。实际上我觉得，不管诗人的漂流的起点是否是因为政治，但是最终我们会发现我们获益于这个漂流的过程，其实远远大于被迫离开祖国的那一刻的痛苦。我虽然住在伦敦，走在街上说着英文，或者在各种国际文学活动里经常用英语和别人交谈。但是所有这些交谈，除了我面前的交谈对象以外，真正的交谈是我之内的那个说着中文土话的，这个潜在的

中国诗人对话，在反思中国的语言，反思中国的现实，在反思中国诗人在中国环境之内的位置，反思中文诗歌与世界诗歌的这个关系。思想家就是这样把生活每一分钟的呼吸都变成思想进步。

#### Q：在你看来，杰出的作家和诗人具有什么样的品质？他们对世界具有什么样的价值？

A：简单地说，我觉得这些作家确实是非常到位的人，这个听起来好像起点很低，但实际也是最高的一个点。比如说布罗茨基和沃尔科特——我跟布罗茨基和沃尔科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西大厅朗诵诗歌，那是布罗茨基生前最后的几次朗诵之一，尽管身体不



#### Q：在海外二十多年的漂流，你的思想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A：最大的变化就是以往的思想得到了确认和加强。这个确认建立在冷战之后，本来以为资本主义一统天下，这个世界大同了。但是十年一觉扬州梦，到9-11一声爆炸，这个梦破碎，人们发现世界面临更加血腥和严酷的的现实。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这种感受，实际上更是极端的绝望，因为在意识形态冷战时期，人们似乎还可以在两大思想阵营之间寻找一种选择，今天则是故之四海而资本主义。这是为什么我后来生出诗意反抗的意识——我从政治的反抗到文化的反抗，最终落实为诗意的反抗。诗意的反抗是全方位的

困境和个人反抗，我的诗歌创作一直在不停地回到屈原的《天问》。屈原从宇宙开创之初问起，穿透整个神话历史和社会现实，回到诗人自我，屈原叩问两百个问题，没有一个有答案，他不停地用更深的问题涵盖以前的问题。这种专业提问者的姿态，就是我们今天作为诗人和思想者的姿态。

#### Q：作家怎样建立有价值的写作？在国际化的写作中更容易建立标准么？

A：对人性的根本性体验的国际化写作中更为彻底。我不认为强调外在困境一定能给作品加分，你的分数是自己挣的，90分就是90分，没深度搁哪儿也没深度。为什么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我看了以后很感动。它没有那么政治化，他的作品我看到的更多的自我反省，自我追问，是他对广博知识的占有，对艺术丰富性的深刻理解，是他充沛的创造力。这样的作品搁在手里沉甸甸的。实际上，真正最严酷的处境是我们自己，最根本的绝境就是我自身，所以一部文学作品如果要反抗，就是反抗这个界限。

#### Q：2008年你参加国际笔会理事选举发表竞选纲领提到“每一个中文作家都必须是思想家”，为什么这样主张？

A：我觉得中文作家要通过不断整合思想资源——不仅是古典中国、当代中国，也包括西方的——所有思想资源，使当代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我们应从简单的被动的——比如被邀请参与国际或组织活动变成主动提出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实际上所有的东西最终都落到一点，就是要对当代作家，作为人的位置和作为创作的位置有深刻理解，确定自己的工作方向。

#### Q：你怎么看国内的诗歌写作？现实的问题，文学或者具体到诗歌写作几乎处于社会边缘的状态。在公共领域，几乎很难听到作家和诗人的声音。

A：回顾过去30年，中国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速度不是太慢，而是太快，诗人面临亟待转型的现实。要能够深刻地理解诗歌的价值和意义，还要能够不仅用思想表达，而且能以创作呈现出质量，这对诗人和诗歌的要求极高。国内文学界最主要的问题是作家或者诗人的质量不够，准确地说应该是作家和诗人作为思想家的分量不够。至于边缘化还是非边缘化的问题，其实不太重要。据说中国现在写诗的人有两百万，真把这些诗人搁在一起，那就是中欧的一个小国。如果中国诗歌界真能建立正常的诗歌判断标准和诗歌判断能力的话，这两百万写诗的人，就已经比盛唐时代热闹多少倍了。所以我不认为数量构成问题，重要的是质量，这是中国作家或诗人最大的问题。□

### 杨炼简介

1955年

出生于瑞士，此后游历于世界各地。

1999年

获得意大利FLAINO国际诗歌奖；其诗集《大海停止之处》，获美国诗歌书翰协会最佳译诗奖。

2008年

在第74届国际笔会大会上以最高票当选为国际笔会理事。

2012年

获得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连续数年蝉联诺贝尔文学奖

1. 在诗歌朗诵会上，杨炼激情朗诵  
2. 杨炼的受奖提名——最初和最后的诗人  
3. 杨炼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本届诺尼诺国际笔会主席奈保尔